# 给校长的这通电话,打给了每个人的童年

□ 袁媛

最近,一通电话全网刷屏。一个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小女孩,做了20分钟心理建设,鼓足勇气拨通校长电话,就为说一句:“我舍不得安老师。”电话那头,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仙林学校小学部的朱永刚校长耐心解释,温柔安抚。

(8月28日《新华日报》)

评论区里,有位网友说自己60多岁了,看得泪流满面。这通孩子气的电话,为什么这么“好哭”?我想,它打给了我们每个人的童年。

我们小时候,差不多都有过舍不得一位老师的经历。可当我们回家说给父母听,得到的回应往往是“适应一下就好了”。憋在心里的情感,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。所以,看到有父母鼓励孩子拿起电话,跟校长说出这份不舍,我们自然心生感慨。

而真正让这通电话刷屏的,是接电话的人。

朱校长的回应中没有敷衍。他尊重孩子,接住了孩子的小情绪,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,教她如何面对离别。

朱校长说:“亲其师,方能信其道。”“亲”从哪里来?从一个孩子知道,她的表达会被认真对待里来。安老师把自己当小朋友,认真走进孩子的世界;朱校长十年如一日,把笑容和耐心留给孩子。润物无声间,“亲其师”已然发生,“信其道”也就水到渠成。

在今天,从学校到家长,大多把关切的焦点放在成绩上。其实,分数之外,关心孩子的小情绪和生活焦虑也很重要。他们烦恼的,也许是好朋友今天为什么不理我了,喜欢的老师为什么被调走。这些困惑,在大人看来不值得一提,但它们偏偏关乎一个人怎么长大。成长焦虑靠考试解决不了,它需要一个个具体的人,用爱、用人格、用日常里的每一次倾听和回应去慢慢引导。这不仅是老师的职责,也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。

也许,我们小时候没有遇到安老师、朱校长,但我们完全可以把曾经的遗憾,用另一种方式弥补——面对孩子时,成为一个好好“接话”的人,把这通电话留给我们的感动,传递给更多孩子的童年。

# 不妨多些『集体升学礼』式创新

□ 胡欣红

日前,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第七届高校学子集体升学礼文艺汇演精彩上演,黄梅戏舞蹈《谁料皇榜中状元》、情景剧《家宴新风》……142名准大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。多年来,集体升学礼这一活动覆盖肥东县20个乡镇、开发园区,近5000名准大学生参加,累计节约宴席金额逾5000万元。

(8月27日《工人日报》)

相比传统升学宴,集体升学礼更注重“里子”,让孩子在进入大学前,得到思想引领、能力训练、心理建设和文化浸润等全方位锻炼。

移风易俗的出发点,是把群众从沉重的人情负担中解放出来。在一些地方,从满月酒到升学酒、搬家酒,宴请名目繁多,群众叫苦不迭。上述集体升学礼,恰恰为群众提供了一个“体面退出”的台阶——社区出面组织,政府搭台、学子唱戏,家长不用再为办不办、办多大而纠结,宾客不用再为随多少礼而盘算,这种“松绑”是靠活动本身的吸引力让群众自愿选择。

移风易俗堵不如疏。肥东县从2023年起在全县推广撮镇镇经验,正是看到了“疏”的力量——用文化浸润代替物质攀比,新的风尚才能在潜移默化中扎根。

与之类似的,还有贵州黄平县黄飘村“不办升学宴,造林树新风”的做法。村里每年为所有考入大学本科以上的孩子颁发奖学金和荣誉证书,还让孩子在林间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银杏树。

无论是集体升学礼,还是升学纪念林,都是用有温度的创新,为传统习俗找到现代表达。

# 手机禁令,靠校规也靠法规

□ 白驹

近期,重庆、广州、郑州等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,明确学校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,将校园手机管理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。

(8月31日《浙江日报》)

一部手机,曾经在校园搅起千层浪。在一些学生看来,使用手机是“天赋权力”,不应被限制。但松懈管理的结果,是不少学生沉迷于电子游戏和社交,对学习的关注度明显下降,也沾染上一些坏习气。

问题是,对教师来说,他们在落实“禁令”的过程中面临不小的阻力。一到开学季,学生就和老师“斗智斗勇”,以至于在一些学校,仿真机竟然成了“上交神器”。为了体现管理“刚性”,一些学校采取过激举措,结果引发舆情。

管理手机的边界在哪里?这是一个问题。为此,一些地方出台法规,划定权责边界,遏制极端管控措施。这就让“手机禁令”既师出有名,又有边界感、分寸感,有助于平稳实施。

管好学生手机,为的是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。

当前,学生用网行为场景多样化,带来了多重问题。例如,刷短视频、网购、和网友交友,可能暗藏被别有用心者诱导等风险。面对这种情形,在校园这一端口强化依法管理模式,防止学生被不法分子的伎俩“套住”、防止学生走上歧途,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管理功夫不能只是花在校园领域中。教育部门、学校当坚决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精神,为未成年人真正撑起一把“保护伞”。学生家长也应正视学生不当使用手机带来的危害,配合校方教育和引导孩子规范、有限使用手机。此外,互联网平台也当强化年龄审核和实时监管。

## 失“重”

一名身高167厘米、体重101斤的女孩,竟被某儿童电话手表判定为“偏重”,并标注“体重超过99%的同龄女生”。且不说如此健康提示既不科学又过于粗暴,儿童电话手表又岂能搞体重排名?不是孩子“偏重”,是产品失“重”。 李嘉

# 作文何必印刷体

□ 东方木

如今,不少家长遇到了同一道“怪题”——孩子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,须由家长逐字录入电脑,转成文件上传软件,再按指定的字体字号与页边距打印出来,剪贴进作业本。作业订正也有讲究,专有名词、核心要点、逻辑关系都要与答案一一看齐。 (8月30日 澎湃新闻)

作文必须印刷体,预制的是形态。订正看齐答案,预制的是内容。形态与内容双双设定,孩子尚在起点,成品的规格已然配齐,唯独闻不到烟火气。

语文老师为何不愿看手写体了?直接的推力来自“卷面分”的焦虑。电子阅卷时代,“卷面分”的执念沿着应试链条下沉,印刷体被当作卷面满分的日常预演。

更深一层是作业本的“展品化”。作业日益成为迎接检查、展评的样本,整齐划一的印刷体天然比参差的手写体“像样”。而教师同样被裹挟其中,教学评价以可视化的规整为优,老师把作文做成标准件,多半也是无奈的自保。

在各门功课中,语文本该最接地气。老一辈教育家反复强调“教文育人”,作文教学倡导“我手写我心”。学生用笔写下的作文,带着体温与思考的痕迹,恰恰是教师诊断学情的入口。一旦换成印刷体,诊断功能消解,只剩展示功能,手段与目的倒置。

从政策层面衡量,这类要求早已越界。2021年,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》明确,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,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。同年印发的“双减”意见重申了同样的红线。

改变并非难事。作业布置回归校内,教学检查多看教师批改的痕迹、少看作业本的卖相,教研部门把面批手写作为语文教学的常识重申一遍——如是,教师不必在排版上用心思,家长不必当打字员。

或许在这个AI时代,培养每个孩子独特的思考、写作能力,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个带着涂改痕迹、长着个人笔迹的作业本,那里才有真实的成长。